文献调查

17 世纪蒙古编年史产生的历史背景

希都日古

17 世纪蒙古史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产生了一批蒙古人自己创作的史学作品。佚名《黄金史纲》、罗桑丹津《黄金史》、佚名《黄史》(或译《黄册》)、萨冈彻辰《蒙古源流》四部编年史就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当时蒙古的政治背景分不开。

自从 1368 年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失去对中原的统治而退回蒙古本土后，蒙古汗室卷入了与异系、异姓贵族争夺汗权的旷日持久的内乱。元廷北迁，加剧了成吉思汗的孛儿只斤“黄金家族”内部忽必烈系与非忽必烈系的异系之间固有的矛盾，忽必烈系后裔垄断汗位的格局被打破。阿里不哥后裔与忽必烈后裔争夺汗位，同时窝阔台后裔也不甘示弱，由此蒙古汗位更迭频繁。1388 年兀思哈勒汗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境内贝尔湖)被明军打败，后为也速迭儿所缢杀，汗位遂落入阿里不哥后裔之手。也速迭儿父子(即罗桑丹津《黄金史》的卓里克图汗和恩克汗)和坤帖木儿、答里巴等均为阿里不哥后裔。后来汗位虽再度转到忽必烈后裔，但几经周折又被窝阔台后裔鬼力赤、阿台父子所夺取。

另一方面，明王朝作为蒙古外部的重要政治因素，不断影响蒙古政局，其主要表现为明初对蒙古采取打击和削弱政策。自明太祖朱元璋派兵北伐至永乐帝(明成祖朱棣)五次北征，蒙古遭到严重削弱。明朝的卷入大大影响了蒙古的政局。随后就是东西蒙古的分裂，东蒙古与瓦剌(卫拉特)争夺蒙古高原的霸权。大体上与明朝永乐皇帝统治时期相始终的东蒙古阿鲁台与瓦剌马哈木、脱欢父子在蒙古的争霸，揭开了异姓贵族争夺汗权的序幕。从此汗权衰微，异姓贵族专权，各封建主割据混战。东西蒙古之间长期争夺，导致对全蒙古的统治权暂时转移到瓦剌部的首领，脱欢统一了蒙古。脱欢之子也先还一度登上了蒙古大汗之位。也先死后，异姓权臣哈剌嗔(喀喇沁)部孛来太师与“黄金家族”旁系毛里孩王相继争霸，混战不休。满都鲁即位之后，异姓贵族仍旧把持朝政，斡罗出、癿加思兰、亦思马因飞扬跋扈，相互杀伐，蒙古社会长期动荡。

长期的战乱导致的政治动荡和蒙古人的草原游牧生活方式根本不利于史书的保存。前苏联蒙古学家沙斯提娜曾指出：“由于保存此类资料十分困难，因此目前无法见到流传至今的 14～16 世纪的编年史。我们不知道这一时期是否存在过定居点，而游牧生活方式对手抄本的保存是不利的。封建割据时期的分裂和破坏、蒙古的封建战争也不利于编年史的保存。”①

这样蒙古人的精神文化作品减少了。另一位著名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把 14 世纪末元朝灭亡后至 16 世纪末叶这一时期称为蒙古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蒙古

[收稿日期] 2003 - 9 - 10
[作者简介] 希都日古(1967 —)，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后；北京 100872

人在文化方面倒退了。[②]

但这种局面，到达延汗统一蒙古后，有了较大的改观。乌兰指出："达延汗恢复大汗的权威，预示着这一黑暗时期的结束，蒙古的文化复兴开始见到了曙光。"[③]自 15 世纪 80 年代达延汗即位，到 16 世纪初，达延汗完成了东蒙古的统一，异姓贵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得到了根本的改变。他诛杀了权臣亦思马因太师，打败了亦不剌和满都来 ·阿哈剌忽，征服右翼诸部，又分封诸子到蒙古各部。达延汗的统一，重新确立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绝对权威，从此蒙古社会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蒙古社会的这种局面，直到 17 世纪前半叶蒙古最后一位大汗林丹汗败亡为止，基本上得以维持。

与此同时，明朝作为长期困扰蒙古政局和社会安定的外部因素，其军事政治上所呈现出的被动状态，有利于蒙古地区政治的稳定。蒙古与明朝之间的长期的战争，严重消耗了双方的力量，到 15 世纪中叶明朝由进攻转入守势，明廷无力消灭蒙古，反过来蒙古也较少进攻明朝。蒙古、明之间大规模战争的减少，最终形成了双方对峙局面。此时明军主动深入蒙古地区的次数少了，而蒙古不时攻入明边，甚至有时深入内地。蒙古分散的部落还经常侵入明朝九边，进行骚扰。尽管如此，"由于来自明朝方面的攻击日益减少，以至于消除，也成为蒙古地区由动荡转为安定的原因之一。"[④]

蒙古社会这种相对稳定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为史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应该说，这是蒙古编年史产生的先决条件。只有蒙古地区人民有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人们从事大部头史书创作才成为可能。

16 世纪末，漠南蒙古各部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与内地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为史书创作提供了物质基础。元朝灭亡以来蒙古社会陷入长期的内乱和战争的深渊，蒙古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在封建主割据混战和明军的频繁进攻下大批蒙古牧民被迫充当兵员，战争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大片牧场荒芜，牧民根本无法安心生产。蒙古地区人口和牲畜数量减少，加上天灾人祸，畜牧业经济停滞不前。由于蒙古地区与中原之间经济联系的中断，导致生产、生活物资的严重匮乏。在物质生产倒退，经济难以向人们提供基本生存保障的情况下，属于精神领域的如史书创作等文化活动就无从谈起了。这里仅以纸张为例，受单一的游牧经济的限制，明代蒙古人自己还不能生产纸张，其纸张主要依赖与中原之间的交换。蒙古与明朝双方频繁的战争往往打断这种交换，加上明朝的长期闭关封锁，纸张缺乏的问题困扰蒙古地区。乌兰曾指出，纸张的缺乏会影响大部头作品的创作。[⑤]蒙古地区，尤其在喀尔喀蒙古发现的大量的桦树皮文献，正是说明了纸张缺乏的状态下蒙古人民对精神财富所追求的程度。

达延汗打败右翼后，让其第三子巴儿速孛罗（即明代汉籍的赛那剌）任吉囊，直辖阿儿秃厮（鄂尔多斯）万户，吉囊之封号由其长子衮 ·必里克一系继承，其次子俺答一系成为土蛮（土默特）万户的首领。到衮 ·必里克 ·麦力艮吉囊和俺答时，蒙古右翼势力更加强盛。特别是衮 ·必里克吉囊去世后，土蛮（土默特）部首领俺答，继其兄成为右翼诸部实际上的领袖。

俺答汗是个足智多谋且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尽管俺答汗控制下的右翼蒙古地处水草丰美，气候适宜的丰州川，畜牧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单一的畜牧业经济毕竟不能满足蒙古社会生产、生活的需求。蒙古地区当时需要大量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同时大量的牲畜及畜产品还需要更广阔的市场。蒙古人所从事的主要生产是畜牧业，而粗放型畜牧业经济本身很脆弱，经不起自然灾害的打击，这也要求与中原较稳定的农业经济进行交流，以弥补传统畜牧业经济的不足。

另一方面，尽管俺答汗发展农业生产，其直辖土蛮部（土默特）的半农半牧经济已达到一定规模，但仍不能满足右翼阿儿秃厮、十蛮地区人民对中原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广泛需求。早在"隆庆和议"之前，俺答汗即招募明朝流亡汉人（内地白莲教徒），[⑥]修建"大板升城"，发展农业。[⑦]17 世纪初成书的佚名《阿勒坦汗传》载：俺答汗"倡修五塔与八大板升，令种谷薯及诸多果木，种植美味食物于蒙古地方"[⑧]。因此，与明朝实现经济交流是当时蒙

古社会的一种客观要求。

俺答汗自16世纪40年代起，为了实现与中原的通贡贸易关系，采取了武力威胁的手段，长期进攻明朝，到70年代终于“封贡告成”，建立了与明廷之间的和平贸易的关系。

政治上的和平局面，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随着蒙古地区与中原之间的通贡贸易关系的建立，其经济实力更加得到了增强。右翼蒙古通过与中原之间进贡、互市等多种形式的交换手段，获得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大量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大量畜产品向中原的输出，为蒙古地区畜牧业经济开辟了市场，促进了牧业生产的发展。与此同时蒙古地区的手工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明、蒙古达成和议后，俺答汗每年向明廷进贡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镀金鞍辔”、“镀金撒袋”等精致的手工业品。[9]另外，俺答等蒙古封建贵族呈献给三世达赖喇嘛的大量物品，也表明蒙古地区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10]

周清澍等学者曾指出，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以及地理位置优越等诸因素，是17世纪蒙古编年史大多在阿儿秃厮（鄂尔多斯）地区写成的原因。[11]蒙古地区生产与交换的发展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增加，使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文化活动成为可能。在黄教传入蒙古地区后，人们掀起了一股学习佛教经典的热潮。16世纪末蒙古人开始《甘珠尔》、《丹珠尔》等巨帙佛经的蒙译这一罕见的文化工程。没有大批精通蒙藏文典籍的知识分子，这种卷帙浩繁的佛经的抄、译的完成是不可能的。蒙古人为此进行的学习佛教经典的宗教教育，培养了精通蒙、藏文的知识分子，客观上为史书创作创造了条件。[12]

达延汗统一后的政治背景对蒙古编年史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深受异姓贵族专权之害的“黄金家族”后裔们，深知巩固和维护成吉思汗孛儿只斤“黄金家族”统治的重要性，因此特别强调“黄金家族”高贵的血统和特殊的身份。他们格外珍视“黄金家族”的世系及家谱类的详细记录。这一点恰恰在17世纪蒙古编年史中得到了反映。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系谱，成为史家们记载的最重要的内容。“所有的蒙古编年史，从《蒙古源流》……基本上都是成吉思汗系的家谱，其中交织着对英雄业绩的史诗般的描写。”[13]

前苏联蒙古学家普齐科夫斯基曾指出：“17世纪编年史反映了那一时代蒙古封建贵族的利益和愿望。《元朝秘史》表明了13世纪封建贵族的目的和意图，为了反映这些利益，17世纪所有编年史都利用了《元朝秘史》。17世纪编年史是为满足草原贵族的利益和愿望而编写的。”[14]当然，这里所说的蒙古草原封建贵族的利益和愿望，就是指维护成吉思汗的孛儿只斤“黄金家族”的合法统治。

显然，17世纪史家是站在“黄金家族”立场上来撰写蒙古历史的。蒙文史书都说加害孛儿只斤后裔，将会遭到报应。[15]他们都反对封建割据和内讧，主张恢复“黄金家族”汗权的绝对权威。因此，强烈谴责异姓贵族如瓦剌的脱欢、也先父子以及（乩）加思兰，亦思马因等人专权的行径。

值得注意的是，达延汗诸子分封，各封建主“画地住牧，各相雄长”，形成了互不统属、各自为主的局面。以巴儿速孛罗后裔为主的右翼，在经济、军事上日益强大，而驻帐在察罕儿（察哈尔）万户的大汗，汗权再度衰弱。俺答汗凭借其经济、军事优势，政治上不仅不服从，反而威胁大汗。打来孙·枯登汗赐给他失帖兀汗（Šite üqan）称号。[16]左右翼蒙古之间的这一矛盾和裂痕，在17世纪蒙古编年史中得到不少反映。如两《黄金史》（佚名《黄金史纲》、罗桑丹津《黄金史》）、《蒙古源流》都记载了达延汗、不地·阿拉克汗时期曾经一度打算兼并右翼蒙古的史实。

到17世纪30年代，新兴的女真（后称满洲）已经征服了漠南蒙古，罕哈（喀尔喀）蒙古和漠西瓦剌（卫拉特或厄鲁特）蒙古也遭到威胁。林丹汗的败亡以及额哲的最后投降，标志着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古汗统的断绝。而以往一向以成吉思汗的子孙而自豪的蒙古贵族不得不臣服于外来满洲人的膝下，这是他们理所当然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的现实。

痛感汗统断绝、民族危亡的蒙古史学家们出于一种热爱本民族的情感，开始撰写本民族的历史。这正如乌兰指出的那样：“满洲的统治往往成为蒙古人撰写自身历史的催化剂。”[17]

蒙古国历史学家沙·比拉也曾说过："在满清统治时期，蒙古人对本民族历史非但没有遗忘，反而更加关心，这简直可以说对异民族的统治的一种反抗。"[18]蒙古人此时只能通过编写历史，回顾他们伟大祖先们的辉煌业绩来表达对外来满洲人征服的不满。日本学者冈田英弘指出："17 和 18 世纪是蒙古人和他们的西边姻亲卫拉特人开始感到他们无拘无束的游牧生活方式的传统世界，以及他们在艰苦战争中的英雄主义正在逐渐消失的一个时代。自然，他们感到不得不将他们祖先的名字和他们完成的辉煌业绩记载下来以保存他们的民族身份。"[19]由于清朝的高压政策，作者们的不满情绪是以非常隐蔽的形式流露出来的。如他们对离自己的生活时代越近的史实——清朝征服蒙古或在蒙古划分盟旗等重大事件，很少涉及乃至干脆避口不谈。

有的学者还认为，蒙古人此时的编年史创作不完全是政治原因，其中也包括保护自己民族文化遗产的因素。如日本学者宫胁淳子说，"17、18 世纪的大多数蒙古编年史，之所以同一时期产生，是因为已经拥戴异民族的满洲人为自己皇帝的蒙古人，为重新审视自己文化遗产，需要把流传下来的祖先的系谱和传承加以整理并总结。"[20]宫胁氏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

17 世纪蒙古史家以成吉思汗的孛儿只斤"黄金家族"的统治为正统，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倾向。如佚名《黄金史纲》和佚名《黄史》正文写成于女真刚刚兴起时期，作者们可能已感到来自东边的威胁，因而强调蒙古孛儿只斤"黄金家族"正统思想；而入清后写成的萨冈彻辰《蒙古源流》表现出的正统思想，其寓意更加深刻。在满洲皇帝取代成吉思汗以来延续不断的蒙古大汗正统汗位的特殊历史时期，史家们却处处强调孛儿只斤"黄金家族"的正统地位。其针对性是不言而喻的。显然，在蒙古史家的眼中女真贵族的统治不是正统。比如，萨冈彻辰洪台吉在提到末代大汗林丹汗之子额哲时，尽管他并未能即汗位，仍称他为"额尔克·孔果尔合罕"[21]。

面对蒙古逐渐被满洲征服的现实，蒙古史家们敢于表露以成吉思汗—忽必烈系为正统的这一政治立场和倾向，反映出蒙古人在思想上并未屈服。应该说，这是一种民族意识的表现。说明清朝的统治不但没有能摧毁蒙古人的意志，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意识。

17 世纪蒙古编年史书的作者们还想通过撰写本民族的历史，让子孙后代了解并永远记住祖先高贵的血统和蒙古人曾经有过的辉煌的业绩，以激发后人热爱自己民族的情感。如罗桑丹津在《黄金史》的后记中明确提到撰写该书的目的是"让众人世代传阅"[22]；《黄史》的作者在卷首就引用五世达赖喇嘛在《青年宴史》(实为《西藏王臣记》一书）中的一句话"凡人不知其来源，则如林中迷路的猴子；不知其宗族，则如玉石雕成的假龙；不读其家史，则如遭到遗弃的婴儿"。[23]

---

①［苏］沙斯提娜《〈黄史〉——十七世纪的蒙古编年史》序言，1957 年苏联科学院出版（俄文版）。汉译文载《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 24 辑，1965 年，白音译，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印。

②［苏］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书面语与喀尔喀方言比较语法》，汉译本第 23 页。陈伟、陈鹏译，沈成明校，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1988 年。

③④⑤乌兰《〈蒙古源流〉研究》导论，中国蒙古学文库，辽宁民族出版社，沈阳，2000 年。

⑥珠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第 52 页，第 76 节说："……白猪年，异邦汉人毕兰百姓喇把、仪绷、笔写契、萨察萨格鲁统绷及汉人李翁齐塔塔勒噶等官员，皆慕君汗之名前来归降。"据珠荣嘎注释，这里的"毕兰百姓"指白莲教徒，喇把、仪绷、笔写契、李翁齐分别相当于明代汉籍的丘富、赵全、李自馨、刘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 年。

⑦瞿九思《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说，嘉靖四十四年(1565）修建了"大板升城"。《万历武功录》，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 年。明代汉籍有关"大板升"的记载还有方逢时的《云中处降录》、《大隐楼集》等。

⑧珠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第 55 页，第 82 节。

⑨万历八年《顺义王俺答贡马表》，参见和田清《东亚史研究·蒙古篇》扉页影印件，东洋文库昭和 34 年版。

⑩萨冈彻辰《蒙古源流》卷七，乌兰译文载，俺答汗献上索南嘉措喇嘛的见面礼有各式金银器、绸缎、牲畜等，总计万件。而阿儿秃厮（鄂尔多斯）部切尽黄台吉和土默特部的达云恰等迎接索南嘉措喇嘛时献上

了“各式珍宝、金银、各种礼帛，蟒缎、绢缎，［以及］戴有金银鼻环的骆驼、备有珍宝金鞍的骏马等共一万件礼品。”

⑪⑫参见周清澍、额尔德尼巴雅尔《（蒙古源流）初探》，载《民族史论丛》，1980 年。该文还驳斥了苏联蒙古学家沙斯提娜所谓《黄史》全书是喀尔喀人写成的观点。此说甚是。从《黄史》、《蒙古源流》所记右翼的世系、部落等内容甚详，而对左翼所记较为粗疏来看，的确是出自右翼的史书。不过，作为另一个系统的两《黄金史》，即佚名《黄金史纲》和罗桑丹津《黄金史》可能是出自左翼蒙古人之手。理由是它们与《黄史》、《蒙古源流》恰恰相反，对右翼蒙古的内容所涉不多，且语焉不详。

⑬［日］冈田英弘《达延汗的年代（下）》，载《东洋学报》（日文）第 48 卷第 4 号，1965 年。

⑭［苏］普齐科夫斯基《13 —17 世纪蒙古封建时期史学》，载《东方学研究所学术札记》第六卷（俄文），1953 年。汉译见《史学译丛》1956 年第 5 期，龚方震译，科学出版社。

⑮两《黄金史》（佚名《黄金史纲》、罗桑丹津《黄金史》）说孛罗忽吉囊与满都鲁汗关系恶化，到其姐姐博郭罗勒公主处求救，险些遭到癿加思兰太师的暗害，后在公主的协助下才得以脱身。公主向其两个孩说：“我自身先殁，不及见了，往后，你们的子孙身系枷锁，却叫活着的人看个够！”朱风、贾敬颜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第 80～81 页，内蒙古人民出版，1985 年。罗桑丹津《黄金史》，原件影印本第 156a 页，蒙古国国家出版社，乌兰巴托，1990 年。意思是说，你们作为癿加思兰的子嗣，将来肯定获罪。应绍不（永谢布）五部几个人杀害孛罗忽吉囊后，两《黄金史》称“这便是永谢布的一桩罪过”，以示谴责。《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第 81～82 页。罗桑丹津《黄金史》，原件影印本第 158a 页。《蒙古源流》卷五说当豁儿剌思人沙不丹加害太松汗时，他的女儿阿勒塔合勒真（即太松汗弃妻）劝其父不要对孛儿只斤氏后裔下手，否则将遭不测。又说记述摩伦台吉被送到毛里海王处一事说：莫兰可汗即位之前曾一度在一个豁儿剌思人家中受奴役，结果那一带发生灾荒，巫师卜算出是对孛儿只斤氏后裔不恭遭到的报应。《蒙古源流》卷六说当应绍不的亦不剌、阿儿秃厮部满都来·阿哈剌忽等密谋杀害达延汗次子兀鲁思孛罗时，另一个阿儿秃厮人出来劝阻，说如果加害成吉思汗后裔，将失去上天的护佑。

⑯就俺答汗所获得 Šite üqan 这一汗号，蒙文史书记载不一致。《阿勒坦汗传》说不地·库登汗赐给俺答汗以 Šuu - tu（珠荣嘎译注本《阿勒坦汗传》，第 207 页）。而《蒙古源流》（纳散巴勒珠尔合校本第 383 页）则说赐给俺答以 Šite ü汗号的是打来孙·库登汗。关于俺答汗这一称号学术界有争论。薄音湖认为既然俺答与打来孙在 1548 年对立，那么《蒙古源流》所谓同年打来孙汗赐俺答以 Šite üqan 汗号的记述不足凭信。参见薄音湖《俺答汗征兀良哈史实》，载《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第 104 页。纳古单夫认为“失韬：有人说是‘汉官司徒的音译’，我看毫无道理。《金轮千辐》作了正确解释，该书指出，失韬汗即‘辅国可汗或副可汗’。”参见纳古单夫《阿拉坦汗的尊号探讨》，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 年第 1 期。日本青年学者永井匠认为从当时蒙古的状况来考虑，《阿勒但汗传》所记 1538 年由众人尚号给俺答 Šuu - tu 号的可能性，要比《蒙古源流》所记 1548 年由打来孙汗赐给他 Šite üqan 称号的可能性大得多。参见永井匠《关于俺答汗的汗号》，载《早稻田大学文学院杂志》1991 年。宝音德力根认为 Šite ü的词源当是“世祖”（即元世祖）的音译。参见宝音德力根《“四十万蒙古”名称的来源及相关的几个问题》，载《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1996 年第 4 期。乌兰认为《阿勒坦汗传》说不地·库登汗赐给俺答以 Šite üqan 称号，恐怕有误，这是把不地汗与打来孙·库登汗弄混了，赐给俺答汗号的大汗应该是打来孙·库登汗。Šite ü或许源自汉语的“司徒”。参见乌兰《（蒙古源流）研究》，卷六译文，注释第 44 失帖兀，Šite ü条。

⑰前揭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 5 页。

⑱［蒙古］沙·比拉《蒙古史学史（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引言第 9 页，陈弘法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8 年。

⑲［日］冈田英弘《蒙古编年史与成吉思汗系家谱》，载《亚非语言文化研究》第 27 号，1984 年。汉译载《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5 年第 3、4 期，忽剌安译。

⑳［日］宫胁淳子《蒙古·斡亦喇惕关系史——13 至 17 世纪》，载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日文《亚非语言文化研究》，第 25 集，1983 年。

㉑参见［蒙古］纳散巴勒珠尔合校本《蒙古源流》第 545 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年翻印本。《蒙古源流》卷八，乌兰译文云：“却说陵丹忽秃黑图合罕运败去世之后，他的妻子——主儿乞惕人金太师之子迭勒格儿太师之女儿速台太后，与儿子额儿客晃豁儿合罕二人，遵照上天的旨意主动返回。”

㉒罗桑丹津《黄金史》原件影印本，第 177a 页，蒙古国国家出版社，乌兰巴托。

㉓乌力吉图校勘本《黄史》第 74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 年。